

经济发展研究资料汇编

亚明“四小花”成功之路

山东省经委经济信息中心
济南实用技术经济研究所

经济发展研究资料汇编

——亚洲“四小龙”成功之路

(概况、香港)

山东省经委经济信息中心 编印
济南实用技术经济研究所

经济发展研究资料汇编
山东省经委经济信息中心编
济南市中印刷一厂印刷

*

16开本 160万字 1992年7月印刷
印数1—3000 收工本费
山东省新闻出版局准印证
(1992)2—150号

前 言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南巡时指出：亚洲“四小龙”发展很快，你们发展也很快，广东要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

当前，西方经济陷入衰退，世界政治格局出现多元化，而亚太地区经济则呈相对稳定的发展。这种国际大环境虽有局面复杂，变动因素大的诸多特点，但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机遇。我国经济经过数年的调整，已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小平同志适时地提出了加快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战略决策，要求我们抓住世界经济形势所提供的有利机遇，审时度势，把握时机，积极参与国际交换和竞争，迅速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因此，认真学习借鉴国外经验，特别是亚洲“四小龙”跳跃式的经济发展经验，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帮助各部门及各党政领导和企业、实业家、有关学者了解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脉络，山东省经委经济信息中心与济南市应用技术经济研究所广泛搜集了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二年的大量资料，经筛选，联合编辑了《经济发展研究资料汇编——亚洲“四小龙”成功之路》。

该资料内容从所涉及的国家 and 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模式、经验做法，外经外贸、管理、投资趋向、外资引进、外贸实务到科学技术、教育、人才、金融、股票、债券、房地产、环境保护、城建、农业、加工业、工资分配、劳动用工及企业集团、企业家介绍等，内容极为丰富，具有分析精辟、对比研究性强、实例生动、数据详实的突出特点，是当前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套很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希望《经济发展研究资料汇编——亚洲“四小龙”成功之路》对于读者了解“四小龙”经济发展情况，开阔视野，启迪思维，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九九二年六月

110724/10

编委会名单

主 编：石 军

副主编：张景奎 匡达明 陶 哲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孙 伟 杨 荣 杨保中

李 钢 李广臣 张晓南

陶 贞 梁卫国 戴庆增

第一部分 亚洲“四小龙”发展概况

目 录

一、“四小龙”经济发展简况	(1)
1. 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借鉴意义	(1)
2. 我与亚洲“四小”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及其对策建议	(5)
3. “四小龙”对欧洲的挑战	(9)
4. 儒家文化与“四小龙”的经济腾飞	(13)
5. 亚洲“四小”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与对策	(17)
6. 亚洲“四小”物价与经济发展关系之比较	(19)
7. 亚洲“四小”财团经济特点与发展趋势比较	(25)
8. 亚洲“四小”农业发展战略和政策特点比较研究	(30)
二、科技、人才开发、工资特点	(37)
1. 科技进步对亚洲“四小”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37)
2. 亚洲“四小”对人力资源的开发	(42)
3. 亚洲“四小”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资结构特点	(46)
三、外向型经济、金融	(49)
1. 亚洲“四小”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及其成功的诀窍	(49)
2. 亚洲“四小”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资金来源	(56)
3. 亚洲“四小”国际金融业日趋国际化和专业化	(61)
四、贸易、对外投资及利用外资	(65)
1. 九十年代亚洲“四小”的贸易走势	(65)
2. 亚洲“四小”对外投资的三大热点简析	(71)
3. 亚洲“四小”发展经济与利用外资的经验	(75)
五、工业经济、企业管理	(78)
1. 亚洲新兴工业国和地区知识密集产品生产的主要方式	(78)
2. 亚洲“四小”发展化学工业的道路	(82)
3. 亚洲“四小”的工厂自动化竞赛	(87)
4. 海峡两岸和香港企业管理中的文化因素	(88)
六、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	(96)
1. 南朝鲜与台湾经济发展策略的比较研究	(96)
2. 南朝鲜与台湾电子工业的比较	(100)
3. 台湾、南朝鲜汇率制度的改革与启示	(104)
4. 香港、新加坡金融市场比较	(109)

第二部分 香港

目 录

一、经济发展概况	(116)
1. 紫荆花开胜旧年 ——一九九二年香港经济展望	(116)
2. 展望 2000 年前后的香港经济	(119)
3. 香港是如何实现社会经济综合平衡的	(121)
4. 香港经济多元化之发展	(126)
5. 香港经济发展的现状、原因及趋势	(129)
6. 运行机制与经济资源的最佳耦合	(136)
7. 香港在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139)
8. 香港政府管理工商业的经验及对我们的启示	(145)
9. 香港各次产业及其结构的特点	(150)
二、信息咨询、人才管理、劳务市场	(156)
1. 香港信息产业的发展及其地位作用	(156)
2. 香港政府的咨询系统	(162)
3. 香港培养外向型经济人才的实践与经验	(165)
4. 香港承包劳务市场的特点与前景	(172)
5. 香港的劳工短缺及其解决办法	(175)
三、贸易经济、期货市场	(180)
1. 91 年香港贸易及制造业透视	(180)
2. 论香港贸易模式	(182)
3. 地位提高、重心转移、角色转换	(189)
4. 九十年代香港服务贸易前景	(192)
5. 香港转口贸易的管理及其商品结构与市场分布	(195)
6. 香港市场营销的特点趋向及其启示	(197)
7. 香港是如何处理国外反倾销的	(201)
8. 香港期货市场考察报告	(203)
四、物价、工资	(212)
1. 香港物价政策的主要特点及启示	(212)
2. 香港的物价、工资制度及其启示	(215)
五、财政金融管理	(219)
1. 略论香港公共财政的政策特点和管理经验	(219)
2. 香港金融市场与中资企业的金融投资管理	(224)
3. 香港税制现状及发展趋势	(227)

4. 香港经济在高通胀中平稳增长	(232)
六、银行发展	(235)
1. 香港银行业的中期展望	(235)
2. 香港银行业的发展、角色和路向初探	(238)
3. 香港银行押汇业务面面观	(243)
4. 香港存款与经济的关系	(245)
5. 近年来香港信用卡市场推广的新策略	(250)
6. 香港的创业基金及其发展特征	(252)
七、股票市场	(255)
1. 香港股票市场概况	(255)
2. 一九九一年香港股票市场三项重大改革措施	(258)
3. 香港股票市场的运作及监管	(261)
4. 从 10 大财阀看香港股市沧桑	(268)
八、保险业	(272)
1. 香港蓬勃发展的保险业	(272)
2. 香港保险市场的现状及趋势	(275)
3. 香港寿险业的品种开发	(282)
九、企业管理	(284)
1. 香港企业管理情况	(284)
2. 香港企业的组织管理制度	(287)
3. 香港企业领导心理之透视	(290)
十、企业集团、企业家及公司	(295)
1. 香港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报告	(295)
2. 首屈一指的香港大地产公司	(301)
3. 香港第一大公司和记黄埔	(306)
4. 新鸿基地产集团	(311)
5. 华资第二大财阀包玉刚与九龙仓集团	(314)
6. 第六大财阀李兆基和恒基兆业集团	(320)
7. 名列第九财阀的恒隆集团	(324)
8. 奇盛集团与三永国际	(329)
9. 着眼华南市场的南顺(香港)集团	(333)
10. 信德企业集团与何鸿荣	(338)
11. 热门候补 10 大财阀	
——丽新国际集团的林百欣家族	(343)
12. 香港百亿首富	
——嘉道理家族	(347)
十一、城建及房屋政策	(352)
1. 香港的旧城改造	(352)
2. 香港政府的房屋政策及其成效	(356)
3. 香港公共屋村	(360)

十二、房地产	(363)
1. 香港房地产市场中短期展望	(363)
2. 香港房地产市场状况及前景	(366)
3. 香港房地产业务初探	(369)
十三、第三产业、电信业、建筑交通及医疗保险	(372)
1. 香港第三产业发展的现状、作用及政策措施	(372)
2. 进入 90 年代的香港电信业 ——高速发展与激烈竞争并存	(377)
3. 香港建筑业现状、管理特色与启示	(379)
4. 香港交通设施建设的投资与管理	(381)
5. 香港医疗保险前景	(384)

“四小龙”经济发展简况

1. 1

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借鉴意义

沈祖良

众所周知，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的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都是面积狭小、人口稠密、资源贫乏、市场有限、环绕中国大陆的半岛和海岛型国家或地区。他们在本世纪 60—70 年代经济的高速发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50 年代以来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和当时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的特殊产物。

战后 50 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为建立遏制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战略包围圈，在中国实行全面经济封锁的同时，对西太平洋环绕中国的南朝鲜、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量“输血”——提供大量军事、经济、技术援助，注入巨额资金，为其开放本国市场。战后至今，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较长的和平发展时期。在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国家（地区）经济日益国际化两大潮流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有了巨大发展。西方发达国家从 60 年代起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这些，给亚洲“四小龙”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亚洲“四小龙”不失时机地抓住并充分利用这一历史机遇，采取了符合本地情况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政策和措施，有力地促进本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这方面，亚洲“四小龙”则给我们提供了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的、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是我们应敞开国门，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抓住有利时机大举进入国际市场，以此来促进和带动我国现代化

建设的飞跃。

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千方百计扩大出口贸易，来带动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范例，对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具有普遍意义。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与亚洲“四小龙”有着近郊和特殊关系，经济和技术都还比较落后，对外开放时间还不长，开放度还不够深，与“四小龙”同处太平洋西岸的社会主义大国，其借鉴意义更为直接。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的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国际分工不断深入，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世界市场大为扩展，交通和通信工具高度发达，信息传播极为迅速，“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各个国家和地区、各个民族相互之间的空间距离大大缩短，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和态势。战后国际分工格局已从战前的“工业欧美、原料亚非拉”转变为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发展中国家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分工。至20世纪80年代，不仅发达国家的“北北”之间、发展中国家的“南南”之间、“南北”之间，而且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贸易、生产、投资、金融、科技等领域的相互联系、相互竞争、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向一体化、国际化发展的趋势不断加强。势头越来越猛的经济国际化趋势，使世界各国卷入经济上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独善其身”。总之，当代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日趋国际化的潮流汹涌澎湃。这在当前和今后对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已经并继续产生巨大影响。在奔涌而来的这种潮流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的发展与停滞、成败得失、是否具有活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正确认识和利用世界经济的变化，取决于参与世界经济的水平，取决于能否抓住经济国际化所提供的机遇和迎接它的挑战。闭关自守的封闭型经济，就意味着被动、孤立、落后。只有坚持并扩大对外开放，大力发展以出口为中心的对外经济贸易联系，大胆参与国际分工、国际合作、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开拓国际市场，为工业化、现代化积累资金，投入经济国际化这股历史潮流，才能迎头赶上国际经济技术水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启示之二是，在建设现代化经济或者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必须从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实行与之配套的卓有成效的产业政策。

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依据战后内外条件的变化，在经济刚恢复的50年代实行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从60年代起一直坚持出口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为实施这一战略，它们制定了与发展战略相配套的产业政策，合理地确定主导产业，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从而跨越了本地区落后的生产力与发达工业国家先进的生产力之间的巨大鸿沟，克服了资金、外汇、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障碍，实现了“经济起飞”。具体表现在诸如台湾协调发展工农业，南朝鲜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升级，新加坡、香港由以转口贸易为主的畸形经济发展成以工业为主体的多样化经济，等等。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应遵循社会主义原则、大国主体原则和比较利益原则，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出发。社会主义原则要求我们坚持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大国主体原则要求我们要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国经济，而不能依附于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比较利益原则要求我们在发展经济中要扬长补短，趋利去弊。我国是一个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的大国，诸多方面与亚洲“四小龙”不同。随着东欧和苏联的变化，以美、苏两极对抗为特征的“冷战”时代虽然结束，但西方对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攻势并未减弱，象目前存在的“海湾危机”这样的地区性冲突也将接连不断；经济

上战后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黄金时代”已告结束，而进入一个低速增长乃至衰退时期，经济区域集团化和多极化的潮流与国际化潮流相汇合，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可谓挑战与机遇并存，风险与利益同在，与“四小龙”经济“起飞”的60—70年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我们只能借鉴和参考，而不能照搬和套用“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战略模式。

我们认为，我国当前正确的发展战略选择是：在强化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并重，外向与内向相结合，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互补，建立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多模式、多层次、多样化的多重循环体系。

为实施这一战略，需要实行与之配套的有效的产业政策，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区确定不同的优势产业为主导产业，通过价格、税收、信贷、汇率等经济杠杆和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手段，支持主导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转换和升级换代，从而使我们尽快赶上世界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启示之三是坚持计划指导与市场调节，或者说是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相结合。

亚洲“四小龙”虽然都属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但除香港外，都注意把计划指导与市场调节、经济杠杆与行政手段（主要是法规）结合起来，政府当局积极干预和管理经济，其中南朝鲜是典型的所谓“政府主导型经济”。南朝鲜当局直接干预经济的作法主要是：1. 建立强有力经济领导机构——“经济企划院”；2. 通过立法形式管理和导向经济；3. 把计划指导作为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从1962年起至今制定并实施了六个“五年计划”，通过计划指导和与之相应的各项政策的配套实施，把国家的宏观经济调节与私有企业的微观经济管理联系起来，把计划指导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减轻了资本主义内在基本矛盾的破坏作用，促进了其经济的发展。

国家直接干预和管理经济，通过计划实现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积聚和优化配置，进行产业发展的导向和倾斜，保护国内市场和民族经济，无疑是经济落后国家保持政治上的独立和主权、经济上赶上先进国家的一条捷径。历史证明，世界上所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后进者，都是采取计划指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即经由中央集权色彩较浓的经济发展道路后来居上的，苏联是这样，德国、日本也是这样，南朝鲜和台湾地区同样如此。中国是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结合，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不可动摇的一条原则，也是亚洲“四小龙”给我们的启示。

启示之四是，千方百计引进境外资本，扩大内部积累和投资。

亚洲“四小龙”经济之所以能在二十多年里持续地高速发展，是以高积累、高投资支撑的，不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是其关键性措施之一。其投资来源，一方面靠大量外援、举借外债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可以说主要是依靠随其经济的增长而迅速增加的内部积累。以台湾为例，60年代初毛储额仅90亿元新台币（下同），毛储率为12%；1981年毛储额增至5500多亿元，毛储率上升至32%；1987年毛储额高达12400多亿元，毛储率高达40.3%。其储蓄率之高，不但远超欧美各国，而且使国内储蓄率一直较高的日本相形见绌。

我国是一个资金严重短缺、百事待兴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已经形成有机构成较高的重工业和有机构成很低的农业这样一种“二元经济结构”，要实现现代化中工业结构高级化和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这两大目标，按世界上取得成功的国家推算，大约至少需要一万亿元人民币的庞大资金。要克服如此之大的资金“瓶颈”，我们既不能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掠夺剥削殖民地和本国人民，也不能象“四小龙”那样倚仗外援，而只能首先

立足于国内积累。为此，在国民收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保证 25—30% 的积累率，抑制消费膨胀，鼓励城乡居民储蓄，尽可能把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积累和生产基金，从而提高国内积累率和投资率。这里有必要谈及的是，我国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有的同志对目前全国城乡居民共 7000 亿元的储蓄和手持现金，视若“笼中猛虎”。担忧一旦出笼冲击市场就不得了。我认为这是杞人忧天之论，以降低利率抑制储蓄来启动市场也是徒劳的。只要社会稳定、不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局势，就根本不会有大部分存款被挤兑出来冲击市场的可能。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上中国人传统的储蓄习惯，我国储蓄率、储蓄额的增长是必然的、正常的、可喜的。同时，要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益，努力减少浪费和损失。

解决我国相当长时期内建设资金的“瓶颈”问题，还要大胆引进国外资金。

启示之五是，创造有利于经济迅速发展的“硬”环境——加强能源、港口、交通、通讯等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软”环境——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和政府的廉洁高效。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硬件”的社会基础设施或社会经济基本结构，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备的超前或同步的基础。自 60 年代以来，“四小龙”极力扩大社会间接资本，在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上不遗余力，使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相适应、相配套的“硬件”日臻完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成为它们在剧烈的国际竞争和动荡的国际经济背景下能够保持稳定增长的基本要素之一。在具体做法上，新加坡和香港是基础设施超前先行，而南朝鲜、台湾则采取大体平衡发展，基础设施与生产发展同步前进。

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电力供应短缺，运输全面紧张，通讯相当落后的状况。我们如果在一段时间（如 5—10 年）集中财力物力狠抓一下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在短时间看来可能使经济增长放慢，从长远来看只会使我国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收事半功倍之效。

一个国家和地区政局稳定，社会安定，政府保持廉洁和高效率，并对经济活动实行有效的干预、引导和管理，是经济高速发展环境的“软件”，是前提。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与它们不断完善这种“软件”密切相关。南朝鲜、台湾在政治上都是长期采取军事独裁统治，新加坡采取强人治国手段。同时，它们又分别进行一些社会改良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政治上的高压和社会经济上的改良双管齐下，使它们自 50 年代以来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相对稳定，一心一意搞建设，把经济建设奉为“至上课题”，提出“经济增长第一”和“工业立国”“贸易立国”路线。不仅如此，“四小龙”为了保证其社会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还注意保持其政府的“廉洁”和办事的高效率，如香港著名的“廉政专员公署”，对肃贪倡廉、打击各种经济犯罪发挥了重大作用。

保持全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是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和保证，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和人民政府的本色，更应该抓紧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反腐倡廉，反对官僚主义，提高办事效率，在这方面理应比“四小龙”做得更好。这样，就能鼓舞民心民气，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启示之六是，重视人才培养，加快科技开发，大力开发本地人力资源，努力形成有利于现代化的人文环境。

“四小龙”经济迅速崛起的经验表明，科技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是工业化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它们在开发科技和人力资源上，一是从发展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入手，充分利用本地充足的人力资源；二是通过增加智力投资，大力增加教育经费，实施普及教育与重点教育相结合，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三是着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专

家学者在决策中的作用。他们实行专家治国,并极其重视国内外专家在经济决策中的咨询作用;四是设法招揽和引进外国人才;五是注重科技的引进、消化、研究和开发,增加科技投资,设立“科技园区”;六是在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中,注意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华,努力形成促进经济发展的思想文化环境。

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的启示是:(1)要始终不懈地抓紧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辩证地看待人口与人手的关系,创造一种能充分发挥我国庞大的劳动力大军的巨大潜力的社会和经济机制,使我们沉重的人口包袱开发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人力资源。(2)把依靠科技进步,充分发挥我国科技队伍的现有优势,继续引进国外先进适用技术,增加科技投资,促使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当作我们的重要国策。(3)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决策咨询作用,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尤其是社会科学、经济运筹管理等软科学人才的重要作用;(4)发展教育和培训,增加教育投资,大力培养现代化建设所需人才,(5)在抓紧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 2

我与亚洲“四小龙”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及其对策建议

翁全龙

一、近年来我与亚洲“四小”的经贸合作前所未有的新发展

近10年来,在亚太地区新一轮的国际分工以及区域经济合作潮流的影响下,特别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与亚洲“四小”的经贸合作关系取得了引人注目、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日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

在亚洲“四小”中,香港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我国内地与它的经贸合作有着明显优于其它“三小龙”的许多有利条件,因而发展更为迅速。就投资而言,香港对我国内地的投资最早、规模也最大。迄今为止,香港对内地的投资额已占外商对内地投资额的60%以上,投资领域遍及25个省市、自治区,投资项目涉及机械、电子、轻纺、房地产等众多行业。香港也是我国内地贸易的主要伙伴。更值得提及的,由于1984年中英两国草签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使内地与香港的经贸合作关系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新阶段。1985年起,我国内地已替代美国,一跃成为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我国内地不仅是香港转口商品的最大来源,而且也是香港转口商品的最大购买者。

我国大陆与台湾的经贸合作近几年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发展。1979年,台湾当局被迫放松大陆探亲 and 贸易政策,台湾岛内立即掀起“大陆热”,从商人到“立法委员”,要求直接通商的呼声日趋高涨,海峡两岸的经贸合作关系由“堵塞”转向“变通”,双方贸易额与日俱增,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1988年台湾与大陆的间接贸易额已达25亿美元,1989年的贸易额达到35亿美元,1990年更增加到39亿美元。在此基础上,台湾一些厂商以香港为跳板,把资金纷纷投向大陆,掀起了“大陆投资热”。据统计,1988年台湾对大陆的投资额为

10 亿美元, 1989 年为 25 亿美元, 1990 年达到 30 多亿美元。目前台商到大陆投资的企业达 3000 多家。协议投资额为 40 亿美元左右, 海峡两岸的经贸合作关系已日益密切。

迄今我国与南朝鲜尽管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 但近年来南朝鲜利用我国对外开放的有利时机, 竭力推行其所谓的北方政策, 努力发展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特别是最近几年, 我国与南朝鲜的经贸合作关系已有突破性的进展。1989 年, 南朝鲜对我国的出口为 17 亿美元, 比 1988 年增长 112%, 进口为 14 亿美元, 增长 65.7%。与此同时, 南朝鲜对我国的投资也在进一步扩大。1990 年 10 月 22 日, 中国国际商会和南朝鲜的“大韩贸易振兴公社”签订协议, 分别在汉城和北京两地互设贸易办事处。南朝鲜方面还提出在签证等方面给予方便, 企业投资得到法律保障等要求。这些要求如获圆满解决, 将会有助于促进我国与南朝鲜的经贸合作更快发展。

新加坡是东南亚与我国贸易的南大门。我国与新加坡过去一直保持经济往来, 但在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之前, 双方局限在交换贸易代表这一范围内。1990 年两国正式复交后, 双方的经贸合作发展很快。据统计, 1990 年中新双边贸易额达到 39.92 亿美元。我国对新加坡出口为 16.93 亿美元, 进口为 14.99 亿美元, 进出口总额比 1989 年分别增长 7.8% 和 1.5 倍。目前新加坡在我国已参与了 100 多个投资项目, 金额约为 4.5 亿美元。新加坡已成为除香港以外进入我国市场的另一途径。

综上所述, 在过去几年中, 我与亚洲“四小”的经贸合作关系日趋紧密, 其进展速度是惊人的。应当指出, 我与亚洲“四小”发展经贸合作关系, 必将促使各自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就以我国来说, 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对外贸易保持了较快的增长。1989 年对外贸易总额达 1116 亿美元, 其中与亚洲“四小”的贸易在我进出口总值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尤其是目前外商对我国直接投资的 145 亿美元总额中, 亚洲“四小”占 70%, 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还需要指出的是, 近年来由于受世界经济集团化趋势的影响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触动, 亚太地区各国希望加强本地区实行经济合作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由于各国历史条件不同, 经济体制差别很大、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各国(地区)的利益和设想也不尽相同, 因而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或区域经济联合步履维艰。在此情势下, 我与亚洲“四小”经济贸易合作关系的发展, 特别是大陆同港(澳)台地区在经贸合作基础上有可能形成大陆东南沿海地带与港(澳)台地区的“中国经济圈”或曰“台湾海峡经济圈”, 必将对进展缓慢的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注入一股活力, 对推进亚太地区各国的经济合作, 乃至改变整个亚太地区目前在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中所处的落后被动的局面作出积极的贡献。

二、九十年代我与亚洲“四小”发展经贸合作关系的有利因素

进入九十年代后, 随着亚太地区各国之间经济互补性分工的日益发展和相互依赖的加深, 预料我与亚洲“四小”的经贸合作关系将会继续得到发展, 这主要是因为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的有利因素。

1. 我与亚洲“四小”的经贸合作已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过去几年蓬勃发展起来的我与亚洲“四小”的经贸合作关系, 不但在传统的贸易领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而且扩展到了生产和投资领域。目前在交通、通讯、旅游、金融、环保以至大型基础设施等方面也已开始了业务项目的接触和合作, 初步形成了互补互利、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经济合作关系。在此期间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联系渠道、合作关系以及经验积累, 无疑为今后经贸合作的继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和更加广阔的前景。

2. 我与亚洲“四小”的政治关系继续得到缓和 这是经济贸易合作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

条件。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我与亚洲“四小”发展经贸合作最终会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制约。近年来，我国政府一贯主张根据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加强并促进与亚太地区各国（地区）双边和多边的经济贸易关系，并以积极的态度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从我国的利益出发，亚太地区是目前乃至将来一定时期我国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重点，因为加强同这一地区的国家（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的经贸合作关系，不仅有利于我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而且对提高我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地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新加坡已同我国恢复外交关系，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因而从政治因素考虑，我国大陆同南朝鲜和台湾的关系就变得至关重要了。近年来国际政治缓和的潮流同样波及到南朝鲜，当局正在谋求同亚太地区特别是我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根本改善，并采取积极促进的政策和措施。再从台湾来看，自解除戒严、开放赴大陆探亲后，尽管当局从所谓“政治安全”的角度出发，对海峡两岸经贸往来实行“不禁止、不鼓励、不协助”的“三不政策”，并对经济文化交流的各种活动进行种种限制，但是，加强大陆与台湾的经贸合作，反映了两岸人民的共同心声，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趋势。迫于这种客观形势的压力，台湾当局对大陆的立场和态度在改变，其政策也在进行调整。当局于1991年5月宣布终止实施“动员戡乱时期”。台湾民间的“两岸开放三通”、“三不应当放弃”的呼声已不绝于耳。两岸关系正经历着由过去的“戡乱”到交流，然后由交流到谈判、再由谈判到建设的过程。目前在两岸不断发展的交流中彼此正在消除敌意、减少隔阂、加深了解、取得共识、共同感受到民族的凝聚力和国家的统一时代意义，这对今后两岸进一步开展经贸合作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3. 经济互补关系继续得到开发和加深 过去几年的经验证明，我与亚洲“四小”的经贸合作，由于坚持互补互利的原则，实现了各自的“比较利益”。进入九十年代后，日本和亚洲“四小”的产业结构继续进行调整，亚太地区国际分工的格局发生变动。亚洲“四小”的资源禀赋是贫乏的，但它们的工业化程度比较高。南朝鲜和台湾都已有了比较坚实的工业基础，并且在八十年代积聚了巨额外汇储备和企业资金，却苦于自然资源不足和劳动力昂贵，急于在东南亚和我国大陆等亚太地区寻找合适的投资机会和场所。香港和新加坡作为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仍向包括我国大陆在内的亚太各国提供资本和技术。比较而言，我国是一个幅员广大、资源丰富、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发展工业化，改善产业结构需要大量的资本和技术。鉴于国际间的比较利益，进入九十年代后，亚洲“四小”由于劳动成本不断提高，货币不断升值，在国际竞争中已逐渐丧失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要素优势，因而它们的产业结构正在向高附加价值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方向发展。相对来说，我国在这方面的优势将在对外开放和国际分工中逐步得到增强。这些都将使我与亚洲“四小”在经济上成为自然的伙伴。很明显，我与亚洲“四小”发展经贸合作关系，一方面可以从“四小”取得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和日本特别是亚洲“四小”之间水平分工的比重，以及和东盟国家之间垂直分工的比重，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提高产业结构的竞争能力，改善贸易条件；另一方面，在我国工业逐步升级的过程中，不断拓宽的广阔市场又可为亚洲“四小”的工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型提供机会。由此可见，九十年代我与亚洲“四小”之间依然存在着资源、技术、资金和市场的互补关系，所以在客观上相互存在着吸引力。毫无疑问，这种互补关系的开发和加深，将会大大促进彼此间的经贸合作关系。

4. 亚太地区政治安全形势的缓和进程有助于我与亚洲“四小”的经贸合作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进入九十年代后，在国际政治逐步缓和和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的影响下，亚太地区政治安全形势继续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经济因素，将逐渐取代军事安全因素，成为影响各

国今后在亚太地区地位和作用的主导因素。因此，更加致力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并将发展对外关系的重点进一步转向经济领域，加强地区经济合作或经济联合，是未来亚太地区发展的主流。这种形势将有利于我与亚洲“四小”的经贸合作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三、我与亚洲“四小”发展经贸合作的对策建议

尽管我与亚洲“四小”的经贸合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这种合作还处于区域合作的初级发展阶段。而且由于我与亚洲“四小”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同，合作的利益不尽相同，由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分歧和矛盾，需要各方在合作机制和发展方向等问题上求同存异，采取相应的措施，去争取合作的更好的发展前景。作为实现经济现代化而进一步推行开放政策的我国，从自身的具体国情出发，积极利用目前国际经济新形势下的有利因素，加强同亚太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的经贸合作，制订出合适的政策，将是决定我国对外开放成功的关键。我们认为，促进我与亚洲“四小”经贸合作的对策应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 提出“政治与经济分开”的原则，适当扩大对亚洲“四小”的开放度 目前我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仍然比较严峻。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中美之间以及我国与某些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将受制于西方政府的政治需要。因此，我国对于西方资金、技术和市场不宜抱过多或不切实际的希望，主要着眼点应放在日本和亚洲“四小”这几个积聚起巨额国际储备的国家和地区。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应当提出“政治与经济分开”的原则，这样既有利于我们争取西方企业家来华投资，也有利于我们在获得政治解决之前，扩大对南朝鲜、台湾的经贸合作。同时在这一原则基础上，我们对于南、台两地区的企业界来大陆经商或投资适当扩大开放政策，把它们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民族资本”或“民族企业”来对待，并实行一般外商所未能享受的某些特殊优惠待遇，使我国这个本来具有很大潜力的投资场所更富有吸引力。

2. 重视亚洲“四小”对我资源的开发型投资 随着我与亚洲“四小”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亚洲“四小”对我的投资呈不断上升趋势，而且投资领域在不断扩大。而我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煤、铁、锰、钨、稀土等矿产储量均居世界前列，石油、天然气的储量也相当可观，这些都是亚洲“四小”所匮乏而又必不可少的资源。况且，我与“四小”地理位置接近，交通运输便利，加上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资源，因此，争取亚洲“四小”对我资源开发型投资的前景是相当广阔的。在这方面，新加坡已捷足先登，率先对我国的石油生产设备进行投资，与我国合作进行海洋石油勘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南朝鲜和台湾对外资源依存度都极高。1986年以前，台商到大陆投资的项目大多以服务业为主，近年来转为以生产项目为主，并且对能源开发等行业兴趣甚浓。南朝鲜也已有这方面的投资意愿。我们应针对它们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进行鼓励，加以引导。如果南朝鲜、台湾来大陆投资，参与资源开发，那末，许多能源、原料可以就近从大陆得到保证，这不仅能满足它们工业化的需要，而且可以改变过去从发达国家进口的状况，有可能使它们的经济从根本上摆脱对西方国家过分依赖的局面。

3. 扩大合作领域，提高合作层次 进入九十年代后，我与亚洲“四小”发展经贸合作，应在继续发展资金、技术、市场、劳动资源及土地资源互补互利的基础上，力争扩大合作领域。具体来说，要把目前的贸易、生产投资领域逐步扩大到金融、信息、科技、大型基础设施等领域，把目前分散的、自发的、短期的局部性合作，逐步转变为基于长远共同目标的、紧密的整体性合作，把民间的合作逐步变成与官方或半官方的合作。特别是亟需加强半官方和官方的合作，以便在宏观层面加强协调和配合。与此同时，努力提高合作层次。例如，在生